

女性主义视域下余华小说女性形象的叙事解构与存在主义困境

柯贤飞

(莫吉廖夫国立大学,白俄罗斯 莫吉廖夫 212022)

摘要: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余华的小说创作始终保持先锋性,其笔下女性形象兼具复杂性与象征性,这些女性或是有着传统伦理规训下的顺从特质,亦或是显露着对父权秩序构成挑战的异质性特征,这些形象承载余华对女性群体的深度观照。细致拆解这些女性形象,这有益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余华作品里女性主体意识逐步缺失并再度建构起来的历程,具备关键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但学界对这一议题的女性主义阐释仍显不足。本文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聚焦余华小说中从“主体意识缺失”到“存在主义突围”的女性形象谱系,通过解构疯癫叙事、物化困境与父权规训等维度,揭示其作品中性别权力关系的文学呈现及对现代性生存难题的隐喻意义,为余华研究提供新的性别视角。

关键词:余华;女性形象;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叙事

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 研究背景

近些年来,学界对先锋作家的研究日益深化,余华作为代表作家被多维剖析,催生大量深广兼具的成果,在这些丰硕的研究当中,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慢慢变成一种不可漠视的文学现象。在余华的小说中,女性形象并非单纯的点缀或象征,而是具有丰富情感、复杂性格和多样命运的立体人物。她们在家庭、社会乃至历史进程中承担多重角色,常常陷入不同的生存困境。余华通过细节描写呈现女性心理,同时观照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方面表现出她们独有的个性风采,另一方面体现出他对于女性遭遇和社会现状的锐利眼光与深邃思索^[2]。

余华小说里的女性形象同样吸引了一些研究者的目光,不过当下这些研究者针对余华作品中女性形象所做的研究,大多着眼于通过系统的分类来实施阐释,这样的研究途径利于我们领会余华小说里女性形象的丰富性,但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仍然有着很大的扩展余地^[3],从女性主义理论批评这个角度出发,针对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展开更深层次,更全方位的研究,此方向可拓展余华小说研究的理论纵深。

1.2. 研究意义

用女性主义理论批评来剖析余华小说里的女性形象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可以弥补当前学术界在余华作品女性形象研究方面存在的空白,如今,余华的作品虽然颇受关注,但对于他小说当中女性形象展开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则较为少见,尤其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所做的细致解读就更少了,女性主义理论批评属于一种独具特色的批评方式,重点在于彰显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权力关系以及女性处于社会文化环境时的生活状况,如果把这种理论应用到余华

作者简介:柯贤飞(1999-),男,硕士研究生,后勤主管,研究方向为社会教育学与心理教育、小学语言、现当代文学。

小说的研究当中，就能让我们更具洞察力地察觉到作品里女性角色的复杂之处和丰富层面，进而去探究隐藏在小说文本背后的性别权力运行情况和话语建构逻辑。

对余华小说女性形象的剖析，既能揭示女性生存困境的文本呈现，把握作家刻画背后的性别思考；同时，女性主义理论为解读提供了新维度，这不仅是对余华小说的深度阐释，更是对文学批评界域的拓展。从而得以更为全方位地认识他的作品所要传达的主旨及意义，这实际上也是对余华小说更进一步的一种解读行为，而且还是针对整个文学批评界域实施的一次颇有价值的加深探究活动，凭借女性主义理论批评这种手段，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领会余华笔下那些女性人物形象及其与作品当中男性形象、所处社会环境文化彼此间的依赖联系，于是便可以更深层次地探寻到余华小说具备的社会意义，更进一步开拓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围视界，给整个文学研究领域增添一些新鲜血液与别样思路。

2. 先锋时期女性形象的叙事特征

小说常常凭借人物形象去映照社会生活，读者会从小说人物形象蕴含的价值意蕴当中，领悟到作者创作之时的情感偏向，不过，余华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小说创作里，却违反常规，斩断了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联，化解了人物理应具备的深刻意义。

在余华的创作理念当中，人物仅仅是叙述故事的“道具”，关键之处在于展示人类本性的欲望，诠释人存在的主观世界，凭借这样的创作观念，20 世纪 80 年代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有着明显男女区别的性别划分，也非具备清晰个性特点和感情线路的单独个体，反而成了叙述的代码，帮助作者形成一种违背一般经验的独特认识形式，这些人物同作者一道，一起营造出一个弥漫着神秘气息，难以捉摸的象征天地，使得读者在探究之时体会到别样的文学韵味和思想震撼。

2.1. 意向性与象征性

2.1.1. 疯癫叙事：非理性镜像中的生存困境解构

在余华的文学版图里，疯癫形象形成了一组特别的生存寓言^[4]，以《河边的错误》作为典型文本来看，作家借由双重疯癫主体的镜像映照，达成对理性秩序的深入拆解，疯癫者在这里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病理符号，而变成异化了的人性褶皱的映照棱镜，透射出文明规训体系之下的精神困局，小说中的疯子形象具备很强的符号象征意义，余华特意把他放在失语者的位置上，并通过周边看客的凝视机制来营造疯癫画面。幺四婆婆与疯子一同现身市集之时，众人的哄笑所产生的言语暴力塑造了一座环形监狱，把二人困在了疯癫的能指链条之中，需要着重表明的是，幺四婆婆开始模仿疯癫之举以后，观看结构出现了不易察觉的反转情况，那些平日里充当疯癫见证人的看客们，就在疯癫表演被主体加以解构的那一瞬间，反倒成了疯癫事实的共犯，这样一种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位置变换，恰恰彰显出理性世界对于异质存在内心深处的惧怕。

幺四婆婆的疯癫性更带有存在主义悲剧色彩，作为封建伦理的殉道者，她在四十八年的守节过程里就已完成精神上的自杀，疯子的闯入实际上就是潜意识对于生命活力的招魂仪式，他的暴力行径被看作丈夫的重现，乳房被啃咬的痛楚成了贞节牌坊另一种形式的铭刻，幺四婆婆在密闭空间重演受虐场景，将身体的痛感转化为道德确证的快感，形成对三从四德的献祭式仪式。此类自毁倾向，恰如福柯所述，是权力规训内化为自我监视的展演。文本中的暴力叙述存在双重悖论，疯子对幺四婆婆实施暴行，这既是一种非理性暴力的具体体现，也是理性秩序暴力架构的一种隐喻映射，幺四婆婆从被虐当中得到满足，这表现出规训社会怎样通过制造痛苦主体来达成道德的再次生产，这样的暴力辩证在关严实屋门的私密情景里到达顶点，空间的闭合性成了道德剧场的幕布，身体上所受的伤变成了伦理秩序的祭祀典礼。

余华在这里营造起来的理性王国其实就是巴塔耶所说的那种异质性空间，警察法外处决

疯子的时候，执法者变成了弑父的俄狄浦斯；村民们一起把疯癫赶走的时候，看客就成了被观看的畸形儿，这样一种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辩证颠倒，显露出文明社会自己指着自己的荒谬之处，疯癫不再仅仅是个别的病理现象，反倒成了解构理性神话的一把利剑，在存在主义的荒原上划出一道血痕，通过这样的疯癫书写，余华达成了对现代性困局的一种寓言式批判，当那个所谓的理性世界用暴力来捍卫自身的纯粹性的时候，它骨子里的疯癫基因也就一览无遗。疯子和幺四婆婆之间存在着镜像关系，这恰如拉康所讲的镜像阶段里出现的分裂主体一般，他们在寻求自身确认之时，便踏入了永远无法摆脱的异化轮回当中，这样的叙述手段既加深了文本原本具有的存在主义色彩，又于解构之际重新建构起文学针对人性难题展开探究的可能性。

2.1.2. 痴傻叙事、暴力寓言与存在主义困境

《十八岁出门远行》属于余华脱离自身训练期的转型之作，该小说凭借巧妙的暴力寓言拆解了成长叙述的传统范例^[5]，怀揣着启蒙主义的纯真理想开启旅途，他寻觅旅馆的行为实际上暗喻着存在主义式的栖息难题，当司机接下香烟却不肯搭载这一具有悖论性质的情景发生的时候，代表秩序的符号系统便开始瓦解：少年所秉持的交换道德观在现实暴力面前变得极为滑稽可笑，司机给予苹果的收买好意以及后来加入抢劫的残暴行径，形成存在主义式的双重诈骗，从而把人性之中善与恶的怪异共存状态暴露出来。

苹果哄抢事件成为关键转折点，把故事拽向荒诞的泥沼，村民们对抢劫行为的麻木不仁以及司机对待暴力如同观赏一般的态度，一同交织出暴力美学的奇异景象，少年用身体去阻拦抢劫的悲壮之举，在司机像散步般漠不关心的目光里变成一场滑稽戏，这样一种暴力观赏机制就像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的现代变奏曲，而当少年试图用话语唤起对方的良心却陷入存在主义的失语状态的时候，加缪笔下西绪福斯的那种荒诞命运便有了当下的回响。

在《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当中，暴力寓言转变成更为彻底的荒诞剧场，主人公被强制性纳入陌生人的哀悼典礼之中，葬礼这种极为特别的场合成了解构主体性的试验田，与会众人一同营造起来的说谎共同体，借由仪式暴力达成了对个人身份的强行重写，主人公由抵触转为顺从的心理历程，体现出福柯所描述的规训社会里主体的生成原理——当暴力披上文化习俗的外衣渗入生活之际，抵抗本身便已沦为荒诞的注解，两部作品中不断重现的错位意象开展着一种互文性的交流，前面那个是物理层面上的迷失方向，后面这个则关乎社会身份的错置现象，少年沿着公路追赶的旅馆以及主人公于葬礼期间找寻的自身，皆可视为现代人在现代性泥沼中遭遇的栖居难题。

2.2. 女性存在样态的悖论突围

2.2.1. 荒诞语境中主体的追问

余华用冷峻的笔触在存在主义的荒原上画出了女性生存的双重难题，他小说里的女性常常被抛入荒诞编织起来的生存网中，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缝隙处表演着存在的矛盾之处，这样一种书写策略超出了性别叙述的浅层含义，指向了现代人共同的生存难题——当世界扯下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显露出加缪所言的非理性岩石的本真面目，女性身为更为敏锐的生存者，最先碰到生命所无法承担之轻。

在《活着》里的家珍，《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玉兰这类人物身上，余华搭建起女性生存的镜像剧场^[6]，她们身处苦难漩涡时既是被看的客体，也是自救的主体，家珍带着令人吃惊的韧性吞下命运递来的全部苦果，但就在这吞咽之中实现了对生存本真的叩问；许玉兰于世间唾沫星子里守着那点稀薄的自尊，凭借市井小聪明拆解着规训社会的道德枷锁，这些女性在荒诞境遇中的苦苦挣扎，恰如卡夫卡在《饥饿艺术家》中所做的那样——对生存意义发出最后的疑问^[7]。

余华通过女性视角撕开了生存真相的帷幕，显露出理性秩序的道德溃疡，《现实一种》当中，女性是暴力景观的见证者与承受者，她的身体变成权力规训的献祭品；而《兄弟》中的李兰，于时代洪流之中展示着个体命运的无根飘零，此类叙述试验表明，当女性打算逃离荒诞牢笼的时候，却更深地陷入了存在主义的迷雾之中，她们既是荒诞世界的牺牲者，也是这荒诞性的同谋者。

这种存在的悖论在文本里形成一种复调式的对话结构，余华令女性角色于苦难之中绽放出令人惊异的生存能量，这既是对荒诞的反抗，也是对荒诞的臣服^[8]，就像家珍历经无数次生死离别仍然执着于活下去，余华笔下的女性以她们带血的掌纹，在生存的荒漠之上刻下加缪式的反抗铭文：认可荒诞，但绝不向荒诞低头，这样的叙述策略既拆解了传统性别叙述的套路，又从存在主义层面重新建构起文学探寻生命本真的可能性。

2.2.2. 偶然性迷宫：存在主义视域下荒诞叙事的解构分析

存在主义哲学视野之下，余华早期创作搭建起一座以偶然性作底的荒诞迷宫，萨特把荒诞认作偶然性的一种必然体现形式，而余华通过叙事实验把这种哲学思考转变成具有冲击力的暴力叙事场景，他笔端的偶然并非传统叙述里的那种情节调剂品，反倒是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存在，成了解构理性秩序的一把利剑。

《十八岁出门远行》里的公路奇遇，是存在主义成人礼的荒诞变奏，少年经历的暴力哄抢和司机背叛，其实就是世界偶然性的暴力祛魅。当苹果这个符号从馈赠礼物变成暴力媒介的时候，少年用鲜血完成的认知仪式，就像加缪笔下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在荒诞之中确认自身存在的真实性，这种偶然性暴力把成长故事美好的面纱撕得粉碎，暴露出世界非理性的本来面目，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则把偶然性推向了集体荒诞的狂欢，主人公被强行拉去参加陌生人葬礼的荒诞景象，实际上是存在主义被抛状态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葬礼这样一个极具仪式感的空间，在这里却异化成了解构主体的暴力机器。当我在陌生人的哭泣声中完成干儿子身份的指认，卡夫英式变形的荒诞在此刻被赋予了黑色幽默的转译——个体如同被偶然性漩涡裹挟的玩偶，任何反抗皆化为荒诞的注解，《现实一种》所描绘的家庭屠杀图谱，更把这种偶然性升华成宿命论的叙事寓言。皮皮失手摔死堂弟本是个偶然事件，却引发多米诺骨牌般的复仇连锁反应，余华于此处搭建起的血色剧场之中，每一位施暴者皆是偶然性的牵线木偶，每个死亡场景皆成存在主义困境的残忍脚注，而暴力美学化的表达，使荒诞感穿透文本表层，直指现代生活的虚无本质。

这些叙述试验一起证实了余华对于存在真相的洞察：偶发性是拆解秩序最为强大的力量^[9]，在先锋时期的作品群里，余华利用偶发性叙述把传统小说的因果逻辑消解掉，把人物丢进存在主义的真空地带，这样的叙述手段不但推翻了现实主义的反映论，而且在哲学层次上重新建构了文学探寻生存难题的范围——当世界揭下理性的面具，裸露出荒诞的本相之时，人只有待在偶发性的迷宫内，才有可能触碰到存在的真实冷暖。

余华以冷峻叙事解构历史肌理，于存在主义的荒原之上搭建起一座依靠偶然性当作经纬度的叙述迷宫，他写的那些个体生命轨迹，实际上就是荒诞剧场上永不停歇的欲望转盘，每一次命运转换都携带着宿命的骰子，在历史的皱褶间投射出灾难的暗影，这样的叙述策略超出了具象化的人物塑造范畴，而是在哲学层面上执行了对存在实质的最后拷问，在《活着》的叙述河流当中，福贵的整个人生恰如一片被偶然性随意拨弄的浮萍。从富家少爷变为佃农老汉，从战场上的逃兵成为身边人接连离世的不幸之人，每个命运转折点皆布有偶然性的裂痕，余华以近乎残忍的节制力，把个体的苦难编入时代的经纬之中，当福贵对着夕阳下的老牛说话之时，存在主义的荒诞感便刺穿文本表面——历史洪水中的个体，仅仅是偶然性巨轮之下被碾成粉末的微尘罢了。《许三观卖血记》把欲望叙述推到荒诞的极端，许三观卖血十二次的生命轨迹，实际上就是生存欲望和荒诞现实相互对峙的图谱，当卖血由急救手段变成生

存仪式的时候，当血缘伦理被商品逻辑解构的时候，余华用黑色幽默的笔调拆解了传统的伦理叙述，这样一种受欲望驱使而产生的苦难变奏曲，就像萨特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的残酷表现形式一样：人处于偶然编织成的欲望网络之中，既是被抛弃的存在者，也是自己造就自己的主体，等到了《文城》里的林祥福，余华把偶然叙述推进到了史诗的范围之内，主人公执着地去探寻文城，这其实就是存在主义式的西西弗斯神话的现代转喻，当探寻自身变为为目标之时，当现实在这份执拗当中化解成符号之际，林祥福的命运轨迹便同福克纳笔下昆丁的追寻达成了一致。

2.2.3. 余华的形而上书写与零度美学探索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坛，受政治解冻及西方思潮的双重影响，先锋作家们用存在主义之刃划开现实主义的蚕茧，余华身为这场文学变革中的弄潮儿，把加缪的荒诞感，萨特的自由抉择以及卡夫卡的异化现象融合起来，铸成专属的叙述语法，于消解历史宏大叙事的瓦砾之上营造出个体生存困局的哲理寓言。

（1）存在主义的东方转译

存在主义文学所具有的形而上特质，在余华这里得到了东方语境下的创造性转换，他不像萨特长篇小说里那些知识分子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存在主义哲学问题，而是把存在主义的抽象命题变成了令人心惊肉跳的生存画面：《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少年碰到的暴力抢夺行李事件，其实就是对世界非理性本质的一种暴力破除魔法仪式；而《现实一种》里皮皮不小心造成的全家屠戮，则成了解构血缘伦常的暗黑传说。这些叙述实验表明，当存在主义的关键命题“存在先于本质”碰上东方集体的生存难题时，个人自由抉择的悲惨后果就会被无限扩大，成了荒谬世界当中最为刺眼的存在标记。

余华笔下的荒诞有着双重解构力量，一方面它是对社会规训秩序的一种推翻，另一方面还是对个体存在价值的一种究极追问，福贵亲人接连去世之后仍然活着，许三观踏上卖血之路始终坚持，林祥福寻找儿子过程中不断漂泊，这些人凭借近似偏执的生存意愿于虚无之中度量着存在的尺度，他们并非传统现实主义里的典型人物，而更像是被抛进存在主义真空中的符号承载者，各自的命运路径映射出历史暴力的偶发性以及生存难题的必至性。

（2）零度叙述的暴力美学

余华对于存在主题的阐释，同其极具代表性的零度写作达成了一种巧妙的互文效果，这样一种摒弃作者自身主观情感的叙述方式，就像一把手术刀那样精准地剖析着人性的肌理组织，在《一九八六年》当中，那位历史教师实施自残的疯狂场面却被平静地当作一次教学示范来展开描述；而在《古典爱情》里面，菜市上血淋淋的人肉买卖也只是被淡淡地讲成生活中的平常事^[10]，通过这样一种叙事距离方面的美学把控手段，使得暴力变成了一块能够映射出存在本真模样的三棱镜。当全部的情感热度都被抽走之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就是生存本来面目所具有的那种荒谬又残忍之处。零度叙述的暴力美学，其本质就是存在主义恶心理论的文学应用，余华把叙述者的价值评判消除掉，把读者径直扔进生存难题的旋涡之中，就像萨特在《间隔》里所看重的那种自由抉择时产生的眩晕感一样，余华令读者在叙述迷宫当中去担负自己作出判断而产生的焦虑情绪，这样一种阅读感受恰如卡夫卡笔下的K，于荒谬的审判进程里慢慢领悟到存在主义的事实。

（3）荒诞史诗的叙事建构

不同于西方存在主义文学侧重于个体精神探秘，余华把存在之思扎根于集体记忆的渊薮之中，《活着》里福贵一家四代人的命运起伏，就是一部精简版的20世纪中国苦难史；《兄弟》中李光头和宋钢的荒诞人生，则映射出时代剧变带来的精神伤害，此类作品表明，一旦存在主义碰上东方集体的生存经历，个人的困窘必定会化成民族命运的寓言。

余华的存在书写有着鲜明的东方现代性特点，一方面拆解传统伦理，另一方面用暴力叙

述来重建记忆的正当性，这样一种双重书写策略，使得他的作品成了后革命时代的精神地图册——既包含着对历史暴力的控告，也是对生存坚韧度的歌颂。余华同样借助先锋叙述达成了对民族灵魂的现代性勘察，这样一种把存在主义哲学化成叙述动力的文学操作，让余华的写作跨越了地域文化限制，收获了普遍意义上的思想价值，他所描绘的荒诞天地，既是东方经验独有的表现形式，也是现代人共通的生存难题映照出的戏剧舞台，就在那零度叙述的冰冷光芒当中，余华最后做到的事情，就是给存在主义命题做出了最具东方特色的现代性回答。

3. 父权制下的女性物化困境

父权制取代母系文明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结构之后，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当中，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秩序通过制度性的约束以及带有象征意味的符号，达成了对女性群体系统性的排挤与疏离，这样一种深入骨髓的性别权力模式不但把女性贬低成低等生物，而且凭借文化上的强制力量将她们限制在附属位置之上——在宗法伦理架构里变成单纯用于延续香火的生育器具，在公众场合失去讲话资格成为失语之人，在文学叙述过程中频繁作为被观看的对象而存在。余华的文学创作就像一面冷峻的棱镜，它映射出父权文明阴影之下女性生存状况的诸多褶皱：她们要么沦为家庭祭坛上的牺牲者，要么于男性欲望的镜像之中碎成欲望的对象，更多的时候还是那些被历史叙述所抹去的缺席之人，只能在生存与尊严之间苦苦挣扎求生，这样一种集体性的沉默，在作家饱含存在主义疑问的笔端转化成对人性异化以及文明弊病的深沉质问。

3.1. 女性地位的丧失

从社会性别秩序形成角度看，父权制通过制度性权力与象征符号编织成控制网络，如《仪礼·丧服传》以“夫者，妻之天”将女性价值绑定于男性意志，形成结构性失语。这种失语在余华《活着》中的家珍身上具象化——她一生顺从夫权，即便身患重病仍以“家珍永远是福贵的妻子”定义自我，其话语始终被男性叙事吞没，印证了波伏娃“女性是第二性”的理论洞察。就算女性发出声音，也常常被当作非理性的情绪发泄或者需要矫正的偏差。

父权文化借由规训技术把女性客体化的过程，表现出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运作方式，通过宗教经典，伦理法典以及教育系统的多次书写，女性被强行界定成先天体弱的第二性存在，这样的符号暴力不但夺走了她作为独立个体应有的权利和尊严，而且通过代际传承变成女性自身的认知范式，当夫者，妻之天这种伦理教条把女性价值同男性意志绑在一起的时候，当三从四德的戒条将女性生命时段划分成父权转交的三个时期的时候，女性主体就在这种象征序列里达成了自我物化的精神驯化^[11]。

空间隔离制度是父权制空间政治的关键策略，它在《礼记·内则》“男不入，女不出”的戒令里表现到极致，这样的性别区分另外塑造起公/私领域的二元对抗，而且通过物理空间的束缚达成对女性社会性的阉割，当女性被锁在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的狭隘范围内时，她们的认识图式就慢慢缩小成家庭关系的维持手段，参加社会文明进程的历史机遇也就完全消失不见，这种空间暴力同《仪礼》里女不言外的告诫相互作用，把女性的主体经验排斥在文明叙述之外，造出了波伏娃所言的历史中的缺席者。

需注意，父权制度的暴力性就隐藏在它文明化的伪装之下，当传统规范用服事于天的伦理崇高感来包裹女性奴役的时候，当空间隔离被美化成阴阳和谐的秩序安排的时候，性别压迫就得到了一种自然化的意识形态包装，这种文化强制力既造就了顺从的性别角色，又通过集体记忆的传承，让后代女性不自觉地承接被压迫者的身份认同，在文明的无意识层面完成对自身的工具化想象。

3.2. 男权秩序中女性生存境遇的多重维度

在余华的文学叙述当中，女性形象的建构常常体现出被父权文化编码的深层症状，那些貌似温顺的依附型人格，实际上就是男性凝视对女性主体执行符号暴力之后产生的结果，一旦文本把诸如贤良贞顺之类符合父权审美预期的美德加诸女性角色身上的时候，这种凝视机制就悄悄地消除掉了女性生命体验之中纷繁复杂的色彩，进而把她们变成了装载男性欲望和道德幻想的空泛所指，女性主义理论表明，这样一种规训绝非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话语操作，相反它已然深入到了身体，感情以及认知层面的文化暴力当中，福柯所说的那种生命权力在性别秩序里显现出格外阴暗的一面。

父权规训凭借象征秩序的细致安排，把女性主体禁锢在贤妻良母的道德藩篱之中，余华笔下的女性人物就像被拉康所说的大他者目光钉死在象征界木桩上的蝴蝶，她们的存在意义被迫换成用来证明男性主体身份的符号资本，在《活着》里的家珍身上，我们看到这样的规训怎样用奉献之名实施对女性生命力的缓慢剥夺；至于《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玉兰，她的人生轨迹显示出父权制对女性身体和名誉的病态操纵。这些文本中的女性角色，就算偶尔有过反抗的火花，却总会被故事叙述的力量重新拖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变成衬托男性生存困境的悲伤印记。

须要注意的是，余华的叙述策略常常通过去历史化操作，把女性困境表现成一种没有特定时空限制的永久难题，这样的艺术决定虽然提升了文本的哲理张力，但也无意之中巩固了性别秩序的天然假象，一旦女性人物被编成苦难的必然承担者，她们的主体性就会在集体潜意识的同情里悄悄消散，这种叙述机制同父权文化把女性当作道德容器的合谋，形成了余华作品中潜藏的性别政治吊诡之处——那些意在拆解生存本相的先锋叙述，竟然无意间重现了压抑女性的文化符号。

3.3. 精神驯化的内在囚笼

在余华的叙述宇宙当中，有关女性规训的景观表现出一种令人胆寒的复调特征，这既是来自父权制度那种由上而下的暴力编织，也是女性谱系内部代际流传的毒性遗传，当那些封建长辈用妇德当作借口来对年轻女孩执行精神阉割的时候，这样的规训早就不是单纯的伦理规训，而成了福柯所说的自我技术的黑暗应用：年长一些的女人把父权法则内化成自己的东西之后，就变成了一台规训机器里极为精确的齿轮，在不同世代的交替过程中达成了对这种重压秩序的永远复制。

《活着》里家珍的婆婆这一形象，可作为这种主体异化的典型隐喻，她凭借多年媳妇熬成婆所积攒的生存智慧，把自己年轻时所受的规训经验转化成新的压迫手段，在儿媳身上执行更为变本加厉的精神操控，这种角色变换的吊诡之处，显露出父权制最幽深的阴谋——通过性别身份的代际传承，让施加压力者亦是最大的受害者，在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假面之下，达成暴力轮回的永久存在^[12]，女性主义理论显示，这种规训的两面性其实就是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的残忍现实版。女性主体不断重复扮演好女儿贤妻良母的角色时，外在规范渐渐转变成内心深处的潜意识监管，许玉兰（《许三观卖血记》）把自身存活的意义寄托于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上，李兰《兄弟》在男权社会的阴影之下被驯服沉默不作声的牺牲者，这样一种内化了的规训体系已经无声无息地达成从他者规训朝着自己殖民的本质改变^[13]。

规训力量最为隐秘之处，就在于它营造出的主体幻觉，那些遭受异化的婆婆们，在挥动父权大棒之时，居然能够收获一种扭曲的权威愉悦感，这种愉悦感实际上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性别变体^[14]。她们身处代际重压之下的镜像游戏当中，一方面是父权秩序恭顺的服从者，另一方面则是其不自觉的同谋者，余华那冷酷无情的文字，正好把这种规训机制的文明假面具给撕了下来，他所描绘的女性群像，既是痛苦的承载者，也是暴力的传承者，就在生存难题和精神异化现象的双重夹击之下，上演着父权社会最为动人心魄的性别传说。这样的

叙述策略使得文章变成了一面映照文明恶疾的三棱镜，如果女性把父权规训化作自身认同感的根基，那么她们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第二性，反倒成了撑起整个性别大厦的无名基石。

4. 女性主义视角的价值与局限

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在女性主义解读框架下展现出独特的价值与内在的张力。其文章本身提供了超越单一社会性别批判的深度资源，同时也存在值得反思的视角局限。

4.1. 余华小说中女性书写的独特性

余华小说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女性生存困境深度融入其先锋叙事与存在主义哲思，并通过冷峻的美学风格予以深刻揭示。

4.1.1 存在困境的性别化承载

余华将女性命运置于普遍的现代性荒诞与非理性背景中。家珍（《活着》）在无尽苦难中“活着”，其坚韧是生存本能对荒诞的沉默抗争；许玉兰（《许三观卖血记》）在世俗压力下挣扎求生，凸显了在非理性世界维护个体尊严的艰难。她们不仅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更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主体，其所承受的是双重困境——性别压迫与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交织，极大深化了女性悲剧的哲学意涵。

4.1.2 冷峻叙事对权力结构的祛魅

“零度叙述”与“暴力美学”成为解构父权隐性暴力的利器。《河边的错误》中幺四婆婆被围观、哄笑直至模仿疯癫的过程，以冷酷笔调呈现，无情揭露了“理性”秩序对“异质”个体的规训与排斥^[15]。围观凝视、空间封闭与暴力循环，共同构筑了“规训社会”的微观模型，清晰展现了父权文化如何通过符号暴力、空间隔离实现女性身心的系统性压制与异化。这种客观、冷冽的呈现方式，比温情书写更具批判力度。

4.1.3 困境复杂性与悖论的揭示

文本深刻呈现了女性在父权结构中的复杂处境。她们是压迫的承受者（如家珍），也常不自觉地成为压迫的共谋者或传承者（如《活着》中的婆婆）。许玉兰将自我价值绑定于生育功能，既是父权逻辑的内化，也是生存策略。这种受害者与施动者在体系内的悖论性书写，避免了简单二元对立，揭示了性别压迫深入骨髓的文化遗传性与精神驯化力量。

4.2. 余华小说中女性书写的局限与反思

从女性主义视角审视，余华的女性书写也存在值得反思的局限，部分源于其叙事策略与作者视角。服务于其先锋实验性、存在主题或暴力美学追求，部分女性形象存在被高度符号化或工具化的倾向，削弱了其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性深度；其“去历史化”叙事策略易将女性困境表现为超时空的永恒命题，模糊了特定历史社会语境下父权制的具体形态，弱化对其社会历史建构性的批判；且文本中女性明确、持续、建设性的主体反抗叙事明显薄弱，偶见反抗多呈现为极端、短暂或无效的形式，缺乏有效改变命运的行动与话语空间，这可能显露了男性作者在构想女性能动性时的视角局限。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女性主义视角系统剖析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揭示其女性书写蕴含的深刻洞见与内在张力。核心发现表明：余华凭借其标志性的先锋叙事策略与存在主义哲思，将女性生存困境深度交织于双重维度，既敏锐呈现了父权制下女性遭遇的系统性物化与规训，更将其升华为现代性普遍荒诞困境的性别化缩影。然而，服务于其美学实验与哲学探索，余华笔下的女性常面临符号化或工具化风险，其“去历史化”倾向易将性别压迫表现为超时空的永恒命题，削弱了对特定历史语境下父权制具体运作的批判锋芒；同时，女性明确、持续的

主体反抗叙事相对薄弱，多呈现为极端或边缘化的瞬间，暴露了男性作家在构想女性能动性时的视角局限。本研究在众多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系统阐释了其如何通过独特的叙事美学深化对女性双重困境及复杂悖论的揭示，并对创作局限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余华全部作品的历时性考察，或置于更广阔的中国当代男性作家群像中进行比较，以深化对文学中性别权力建构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张磊. 父权视野下女性的声音——论余华小说中女性形象[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 24(06) : 38-40.
- [2] 朱乐. 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新变研究[D]. 兰州大学, 2022.
- [3] 张梅. 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余华笔下的女性形象[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2, (04) : 23-24.
- [4] 赵诣. 浅析余华《活着》中的女性形象[J]. 文学教育(上), 2018, (12) : 36-38.
- [5] 熊锦华. 论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意识[J]. 南方论刊, 2017, (07) : 85-88.
- [6] 贾佳. 浅谈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地位[J]. 新西部(理论版), 2015, (16) : 100+161.
- [7] 任竹良, 胡辰田婧. 浪漫构想中的温情叙述——论余华小说《文城》[J]. 铜陵学院学报, 2022, 21(04) : 71-74.
- [8] 王彦珍. 从冷漠到温情: 余华小说女性书写的转变[J]. 今古文创, 2021, (43) : 10-11.
- [9] 刘虎. 男性世界里的虚幻镜像——从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看其男权意识[J]. 凯里学院学报, 2012, 30(04) : 112-114.
- [10] 冯艳华. 余华小说女性悖论式叙事的后现代性[J].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2, 28(06) : 145-148.
- [11] 王海华. 女性主义视野下余华小说中女性形象研究[D]. 燕山大学, 2024.
- [12] 戴重谊. 余华小说中的暴力模式研究[D]. 深圳大学, 2023.
- [13] 所芸菲. 余华小说女性形象研究[D]. 黑龙江大学, 2024.
- [14] 王雯珺. 浅析余华笔下的女性形象转变[J]. 长江小说鉴赏, 2023, (24) : 72-75.
- [15] 张婧禹. 论余华前后期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转变[J]. 长江小说鉴赏, 2023, (14) : 62-67.

Narrative Deconstruction and Existential Predicaments of Female Images in Yu Hua's Novel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KE Xianfei

(Mogilev State University, Mogilev, Belarus 212022)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Yu Hua's fiction has consistently retained an avant-garde edge. The female figures in his works are both complex and symbolic: some bear traits of obedience shaped by traditional ethical discipline, while others display heterogeneous qualities that challenge the patriarchal order. These images embody Yu Hua's sustained and probing attention to women. A close dismantling of these portrayals helps illuminate the trajectory by which female subjectivity in Yu Hua's corpus is progressively eroded and subsequently reconstructed—a trajectory of clear scholarly significance that remains underexplored from feminist vantage points. Anchored in feminist theory, this article traces a spectrum of female images in Yu Hua's novels, from “the loss of subjectivity” to “existential breakthroughs,” and, by deconstructing narratives of madness, the dilemmas of objectification, and patriarchal disciplining, reveals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gendered power relations and their metaphorical bearing on the quandaries of modern existence. The study offers a new gendered perspective for Yu Hua scholarship.

Keywords: Yu Hua; female images; feminist theory; gendered narrative